

海外学者散文

剑河倒影



陈之藩/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剑河倒影

◎ 陈之藩/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河倒影 / 陈之藩著 .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8

(海外学者散文/陈子善主编)

ISBN 7-213-02064-1

I . 剑… II . 陈…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407 号

剑河倒影

陈之藩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石英飞 陈巧丽
责任校对	朱晓阳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县瑶琳新村 3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27.6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8000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064-1/I · 20
定 价	22.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代序：日记一则

陈之藩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三，香港

昨天上午还在台南时，接到杨振宁教授从香港来的电传，他说今天晚上六时到帝都酒店来找我。我于昨天下午三时由高雄搭机来港。因港台的两机场与市区间的接驳均相当费时，到旅舍时，天已黑了。身体虽不觉劳累，精神却也感困倦。一夜无语与一觉醒来之后，拉开窗帘往外看，是一片眩目的阳光，而回顾时，满室是一片悦目的洁白，心神泰然。

我有多半天的时间可以整理一下所带来的电脑算出的数据与图表，更重要的是我如何提出我的思想，好与他讨论：是关于狄拉克的单冲函数的一个问题，因为性质是太基本了，图示也太意外了，所以跑来一趟向他请益。

狄拉克，不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位狄拉克，也是我们所熟知的狄拉克的单冲函数。不过，电脑算出这么一堆美丽的曲线令人置疑之余，不能不深思，

深思之后依然不无困惑，还是与高明切磋一下比较好。这个约会还是我月前在波士顿大学时想起，知道他十二月将到港，我则可以由美去台，再由台来港。

杨振宁是非常佩服狄拉克的。像狄拉克那样纯洁的人格与风格，有谁不佩服呢？杨也曾请狄拉克到纽约石溪作学术讲演，当然他也一定请过狄拉克去石溪教书；而狄拉克在剑桥大学退休后并未去石溪，而是去了佛罗里达，据狄拉克自己的解释是：在佛州比较容易散步。这话提起来有三四十年了罢。我在剑桥大学留学时，也见过狄拉克，印象是他一言不发。我当时的心理自然是英雄崇拜，而那种崇拜心理自然来自他一清如水的论文，而不是由于他的一言不发。

有人也许要问，难道狄拉克所创的工具——单冲函数，还有什么增益的可能吗？科学研究的新工具，如同旅游上的新运具，车载你到新的园地，船载你到新的海湾，飞机载你到新的大陆，而在科学境界中，显微镜、望远镜、电子显微镜等带你深入到洞中的深洞，又领我们伸展到天外的新天。狄拉克所发明的奇奇怪怪的简单符号也是类似工具的，帮我们走向相对的量子世界。可是电脑这个工具的发明，可以说把狄拉克的符号又一一坐实了。运用电脑所得的结果，常常是狄拉克那个时代所无从想像的。我在旅舍的小屋中的多半天，是想这些问题。

六时整，屋里的电话铃响了。

“陈之藩，我在楼下。”

“我就下楼到客厅来。”

我实在爱听杨教授叫我的名字，就是这干干脆脆的三个字。真是几十年了，没有听到别人如此叫过我，理由还不只是

如此，他所发的这三个字的声音，既不是他的故乡安徽口音，也不是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更不是纯粹的北京话，是清晰中有一点土，清亮中有一点钝。我太熟悉这种声音，没有任何人这样叫我，除了我小学时的同学。他这一声唤把我拉回好几十年前。

我是河北霸县人。向人说不清楚是霸县或是巴县时，还要细加如下的解释：如果把北京、天津与保定当作三个点，经三点做一圆的话，那个圆心就是我的故乡霸县。

可是，杨振宁的声音竟是我家乡的声音，像小学的同班同学在叫我。可是，不对呀，我知道杨由出生到六岁罢，是在他的家乡安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住在“四进的大房子里”。小学时代大概是住在北京郊区的清华大学，中学是在北京城中的一所教会学校，无论怎么推理，也推不出他的声音与我的家乡会有什么关联，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最大的可能，当然是我的猜想，是他家在清华园时，用有仆从，而那些仆从是来自我的家乡。我们这个家乡霸县，有很大一部分是碱地，不宜种植，很难以务农为生，孩子们四处奔逃求活，于是出了些服务界的人员。那时的服务人员的工资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个大学教授薪资的百分之一，更不必说杨武之博士是刚由美归来教数学的名教授了。我的家乡所出的这些服务业人员，比如厨师啦，保姆啦，男女打杂的佣工啦等，每人每月所挣的钱最多可买五十斤面粉。当然服务界中也出大人物，比如在清宫里闹得乌烟瘴气、甚至弄得天下大乱的李莲英好像也是我的同乡。总想考据一下杨家在北京时的仆人，多少次谈天，却都忘了问他，这一次仍未问及。

我同杨教授走上二楼的餐厅——帝都轩。六时去吃晚饭是早了些，大概是刚开始营业，而这么大的空荡荡的饭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

“香片。”杨对侍者说。

香港的这类饭馆，自然是什么品种的茶都为客人预备。由客人所叫的茶名，大致可以辨别来自何方。如叫铁观音的是潮州人，叫龙井的是上海人，叫乌龙的来自台湾；而杨叫的是“香片”，非来自北方而何？于是，我更觉得他是我的同乡，声音相像之外，口胃也这么相同，如果不是他家在清华园时的保姆或厨师所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家庭教师、小学或中学的老师影响了他。

杨在《父亲与我》的散文中，曾提到父亲怕他在洋学堂里学不到中国文化，特别请清华大学的同事、名历史学家雷海宗教授推荐一位学生给他补习古文。我忽然想起来了，立时就问：“丁则良给你补些什么古书？”

“《孟子》我会背全书。”杨振宁答得非常快捷，同时脸上浮出儿童似的笑颜。

“我想，《孟子》我背不过全本来；《孟子》中见梁惠王一章我能背出三分之一来就不错了，后面的章节只能断断续续地背几句。”

我比他最多也就是小四五岁，我们的父亲辈那一代的想法是相当特殊的。他们认为新式的小学只是玩玩跳跳、唱唱闹闹而已，学不到什么真正的功课。杨的父亲纵然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回到清华园后，还是为他的长子找国文老师补习私塾中的名课本——四书五经。

我的父亲是北京大学毕业，我还记得看过他的毕业文凭上有校长刘哲几个大字，至于什么系或什么门或什么科，我竟然不知，也就是因为北京大学毕业，我父亲回桑梓服务做过东关小学校长。他虽是新式小学校长，但也给我请来一位老童生在年假暑假时为我补习古文。

这位童生老师也是以《孟子》为我启蒙。所谓启蒙也就是背书，而我实在不会背书，老师倒也未照家塾规矩，大打板子，他就改教我背《千家诗》。《千家诗》的第一首是：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老师都会背，而学生却总背不全，老师遂觉得教这么笨的孩子，实在无聊，就说起笑话来：有人惧内，比如说，我怕你的师母，就叫惧内。此人把这首诗改成如下：

云淡风轻近夜天，傍花随柳跪平川。
儿童不识余心怕，将谓偷闲学拜年。

这种改成打油的歪讲法，对我背书倒很有帮助，我因此很容易地记住了，竟至今不忘。

杨的补习老师既然是雷海宗的学生丁则良，古文根底一定不差，用不着歪讲或改诗，杨也一定是很容易地背过来了。如果这位丁老师得了雷海宗教授的真传，那他一定给杨振宁讲很多《左传》，而不一定开讲《史记》。雷海宗对《史记》是有偏见的，只要他属笔为文，必把司马迁予以贬抑。雷总是说司马迁乱扯一阵与乱凑一番，只有文学价值，并非史学云云，而对《左传》则褒扬备至，三致意焉。

杨振宁由清华园进北京城上中学时，大概才与时潮接触。他的中学是个教会中学，他惘然地回想说，没有什么太多特殊记忆，惟有“在中学生活里，有个读书会，读书会中还有位会长似的首领，是朱自清教授的儿子，他好像比我们大很多，身子也高很多”。杨把他的回忆伸展下去：

“七十年代时，我回国曾不止一次专心打听过丁则良老师及这位读书会会长朱同学，结果是前者不知所终，后者死于非命。”显然杨的这一师一友对他的幼年及少年有过很大影响。过了几十年后，还是念念不忘。

所谓读书会，大概是共同学习同属一类的书。在那个时候，我猜他们所读之书，不外鲁迅的《呐喊》啦，茅盾的《子夜》啦，也许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或邹韬奋的生活书店所出的书，也许还有把马克思的名字改印成卡尔等类的书籍。对十几岁的中学生而言，影响不会不深的了。

卢沟桥事变的一九三七年，如同山洪暴发，混茫乱流。杨随同家庭被冲到安徽，再冲到云南。我却由京津保定的中心被冲到北京城来。应该还差一年小学毕业，到了北京考起中学来。

乡下孩子初到北京，又是日本人刚刚占领的北京，几乎什么都不认识。比如街上成串的电车，那么大，又那么长，而车少人多抢着上车的人经常从车窗爬入！而长者对小孩总是说，如何绕过日本站岗的哨兵，不要近前，更不可斜视。我是穿着一身白色的功夫裤褂，足登千层底的布功夫鞋，从家门口就可望见像山一样高的鼓楼，但走向它时，已走了半个小时，而鼓楼却仍是那么遥远。转个弯，进了前锣鼓巷，即是我的进德中学

了。在街上曾听到同年龄的他校同学嘲笑我：“你们学校在全市考倒数第二。很不错呢！因下面还有个倒数第一。”但我这一身打扮，在全市倒数第二的中学中，也遭人耻笑，好在很快就是秋季，有个蓝布大褂就可盖住一切功夫装了。千层底布鞋确实不易换成皮鞋，因皮鞋实在是太贵。

功课则更跟不上了，因为我们东关小学只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有些土气的老师，教国语、史地与写字；另一位是有些洋气的老师，教算术、音乐与体育。土老师大概被洋老师轻视，所以常在洋老师的背后批评洋老师：“什么鸡兔同笼问题，你们谁家把鸡与兔装在一起？什么父子年龄问题，反正永远是父亲年纪大，儿子年纪小，儿子的年龄永远追不上父亲。”我是以这种老师教来的程度进入中学的。

但是，日本占领的洪水把多少中国人的脑筋冲清醒了。全市倒数第二的这个中学的老师们，大概都想起“最后一课”来。事变开始于七月七日，在九月开学时，不只是街上的容貌变了，就是学校的课程表也变了。比如英文由每周六小时改成两小时，加了日文；算术的钟点也减少了；国文则以年代为序，开始要小孩子读经。比如《诗经》的“蒹葭苍苍”等。令人惊异的，事后想来，是老师的特别卖力。就以英文老师说罢，他自愿地把新规定的每周两小时的英文课，补加三小时，反而成了五小时了。算术则直接教代数，我在小学学鸡兔同笼与父子年龄时所遭遇的艰难与所表现的笨拙，全因会了代数迎刃而解了。国文老师则加教文天祥的“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零雨打萍”和顾炎武的《日知录》来。这些老师们的对学生功课的自由加工，在好学校是办不到的，因为日本的爪牙是先伸入那些好中

学，慢慢再伸入到烂中学去，于是我们这个烂中学的老师们都拿出“最后一课”的精神，把国破家亡的隐痛分别转成教育子弟的具体办法而振作起来。而这所烂学校竟于一夜之间跻身于上游；我是随着这股暂时的向上涌流进步很快，而在三年后能考上市立第五中学的高中。

可是，代价却很大。那位进德中学的英文老师在我上初中三年级时就失踪了，有人说他被日本宪兵队押入红楼，受刑而死；大家则希望他远走后方，去了重庆。没有人可以清晰地说出他的故事来。本来吗，他把两小时的工作自愿延长为五小时，怎么逃得过日本爪牙的寻隙与戕害。

中学的六年，我所受的是不折不扣的铁蹄横加蹂躏而老师却奋发有为的沦陷教育。这个时期差不多相当于杨振宁的大学及研究院教育期间，他的前期大概是昆明挨日本飞机的轰炸，后期则是国共斗争时期了。

杨回忆起他在西南联大时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大一国文与大一英文，他说：“不知为什么好多个老师共同教一门国文。”当然啦，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的教授合起来，人才太多，只有共教一门课了。国文由清华的朱自清、闻一多，北大的沈从文等教；一周换一个教师，真是又多又乱。英文教课大概也差不多，不过杨至今尚语带抱怨的是叶公超的英文课，他说：“叶公超也不预备，也不讲解……”杨对我说这类话，大概还保留几分厚道，据他的同班同学许渊冲说，“杨问叶一问题，叶不仅未予解惑，反而讥讽两句以作答”。

叶公超恃才傲物的性格，我们可以想像。许渊冲的话与事实真相相距不会太远。至于高年级的专门课，比如跟吴大猷做

光谱论文，跟王竹溪学统计力学，两位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由英国剑桥大学刚回来的留学生，他们是紧追时代，力争上游。这些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了。

我高中毕业以后，是要逃出沦陷区的北京，奔向自由区的重庆，是由北京坐着火车先到徐州，转车商丘，下了车坐双轮手拉的排子车，装作小商人越过中日对敌的封锁线亳州，过十字河后是安徽的界首。那是前线，随时都可能死在日本兵的刺刀下。因为那时只看过《三国演义》，自况是落败时的刘备，好像重演刘玄德当年之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从界首又折返西北方向，斜穿河南全省，直奔洛阳。真是一步一脚印地走了十天。终于在洛阳的收容所落脚，那是要聚集四面八方青年来归之地，从这里再出发，再向西行，坐上钢皮闷人、只有枪眼并无窗户的火车，要闯潼关了。

所谓闯潼关者，是火车夜行，而隔黄河对岸的日本兵，照例隔着河盲目地对着火车打机关枪，火车也只是开足马力前驰。听见几声机枪声响，我们都伏在除了牛粪、即是鸡屎满布的车厢底面，是死是活，只看日本机枪的有眼无眼了。

由洛阳深夜启程，翌日清晨火车到达华阴，车门一开，是迎面而立的华山，其峭拔，其俊秀，其清新，把车上鸡屎味、牛粪味、弹药味、烟炭味一扫而空。

以后的各站，都可以由诗句代叙了。由“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暖洗凝脂”的华阴，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西安，经“六军不发无奈何，危转蛾眉马前死”的马嵬坡，过“假道于虞以伐虢，唇亡而齿寒”的虢镇，在苏东坡又题诗又写字的东湖附近的凤翔军训半年，遂由秦岭南下，经张飞种树的陡径

与险路，暂歇于张良辟谷的留侯祠。最后是在距刘备称王的汉中并不甚远的古路壩，我考入了与西南联大遥遥相对的西北联大的工学院，又称为西北工学院的电机系。

在古路壩的西北工学院一年，抗战就胜利了。在狂歌乱舞中，唱着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复员到天津。去后方与回天津差不多走的路相同而方向相反，是很像做了一场梦，醒来时已在西堤的北洋大学了。

杨振宁与我首次握手也只是听完他的演讲后的祝贺握手，在一九五七年，他还未得奖的前夕，我那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大概在二十几年后，才在香港碰面。他兼任中文大学博文讲座后，就常来香港，我则从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五在中文大学做讲座教授，主持电子系。

我今天特别来港要与他讨论这个狄拉克的单冲波的新问题，但一见面就谈起儿时的跑与跳、爬树与唱歌了。

于是，我拿出用电脑所算的结果给他看，他看了片刻，很慎重地说：“单冲函数在量子力学应用的并不多。”反正学术研究总得寄给学报审查以为断，我也就不再问了。

我在十多年前就给过他我的散文集，里面包括《旅美小简》，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学时写的；《在春风里》是我在曼菲斯刚教书时写的；《剑河倒影》是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时写的。离开香港后写的《一星如月》，在台湾及在波士顿大学所写的《时空之海》是在后来出版时送他的。近来在台屡次出版的散文集总是包括这四本小书，可以说他都看过，唯有我们共同发源地——上中学、小学的北京，与国内的大学，我没有仔细地写过。

已经谈了三小时，主要是听他叙说青少年时代，我也无法不同时回忆我的儿时与幼时，倒很像两人在说梦话，他忽然感慨起来：“从前我总觉得六十岁是一不可思议的年纪，现在早就过去了。”

九点略过，我与杨教授步出餐厅，走向楼梯，他同时说：“我今天才知你是北洋大学的。”送走了他，我返身上楼回屋。

元方星期三的七时到九时有课，现在也许已教毕回寓了。打个电话。我说：“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地球表面上有两个点，北京与香港，今晚特别凸显出来，我与杨都是从彼点北京到此点香港。杨是经过这两点所联的一道天上的彩虹，漂漂亮亮的；我很像这两点之间一道地上的溪水，曲曲折折的。”

元方听后，沉默了一下说：“你这天上与地上的比喻，使我想起吴宓给陈寅恪的两句话来。陈寅恪与吴宓两人的诗都很不错的，而两人也很要好的。可是吴宓总觉得他自己所写的诗不如陈寅恪的好，而想向他请教，求他修改。在吴宓的空轩诗中，有这样两句：

冲天逸鹤依云表，溷地残英怨水滨。”

我接下去说：“我说的天上的彩虹与地面的溪水并不只是说成就的高低，而且也实在是说彩虹环境的单纯与溪水遭遇的复杂。我与杨的话题从忆儿时到进入中年后，他由快乐的调子忽出现一并不协调的低音，是触及伤心事了。而这伤心事是他那单纯的性格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我听后的感想则是：他虽背过全部《孟子》，但他并未咀嚼《孟子》中一些很特别的话。

“比如：‘内无法家拂士，外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外无敌国外患，不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吗？应该国恒兴啊，为什么

是国恒亡呢？

“又比如：‘一介不取，取伤廉；一介不与，与伤惠。’前半句易懂，后半句是非常令人困惑罢！赠给人一介之小的东西，为什么反而是伤了惠呢？”

“这两个例子，前者出自《孟子》，后者是否出自《孟子》，我一时记不起来了，你一定记得罢。孟子所说的这些道理，用科学的话来说，就是非线型现象与非线型设计。杨的际遇是太单纯了。可能有时把‘义’做过了火，成了侠义，侠义的义就不是义；是过火，并非事之宜；因之心伤是过犹不及所付的代价。”

挂上电话，并未拉上窗帘，外面是万点晶莹；不是繁星在天，就是灯火在地。时与空已化为混沌，梦与醒渐分不开。狄拉克的图线又袭来脑际。睡了。

目 录

代序：日记一则 陈之藩(1)

• 旅美小简 •

前记	(3)
月是故乡明	(6)
出国与出家	(9)
童子操刀	(12)
并不是悲观	(16)
智慧的火花	(19)
到什么地方去	(22)
成功的哲学	(26)
失根的兰花	(29)
哲学家皇帝	(32)
钟声的召唤	(35)
祖宗的遗产	(38)
钓胜于鱼	(41)
山水与人物	(45)

免回自己	(48)
泥土的芬芳	(51)
印刷小工诞辰	(54)
智者的旅栈	(57)
惆怅的夕阳	(60)
哈德逊剧院	(63)
河边的故事	(66)

• 在春风里 •

寂寞的画廊	(71)
几度夕阳红	(77)
迷失的时代	(81)
——纪念海明威之死	
愿天早生圣人	(85)
科学与诗	(88)
永恒之城	(92)
方舟与鱼	(95)
周末	(99)
春联	(103)
——祝适之先生七十生日	
谢天	(108)
第二信	(112)
——纪念适之先生之二	
第三信	(116)